



The Honor Code:

How Moral
Revolutions Happen

荣誉法则： 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美〕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著

苗华建 译

《纽约时报》2010年度最佳图书

《泰晤士报》2010年度优秀图书

《独立报》2010年圣诞节推荐图书

梁文道凤凰卫视两期专题推荐
查建英引荐出版并作精彩评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美)阿皮亚(Appiah,K. A.)著;苗华建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117-1113-7

I. ①荣…

II. ①阿… ②苗…

III. ①荣誉-案例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622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he Honor Code:*

How Moral Revolutions Happen, by Kwame Anthony Appiah

Copyright© 2010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叶 芳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总编室) (010) 52612339(编辑室)
(010) 66161011(团购部) (010) 52612332(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编辑说明

本书的英文原书名是 *The Honor Code: How Moral Revolutions Happen*，原著中使用“honor”一词的频率非常之高，几乎正文中从头到尾每一页都涉及到该词的使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断与我们及相关学者讨论“荣誉”一词的中英文相同与差异。显然在反复阅读、翻译这本重要著作的时候，译者和编辑都感到这是一个选择上的难题，“honor”或“荣誉”它们之间对应的词意有时可以与“名誉”“名声”等词相互替换、兼容，有时上述对应关系的表述中显示出微妙的差别。单纯以中文的“荣誉”一词来对应英文“honor”，难以完整、准确地将该词的意思完全阐述清楚，细心的中文读者也许会在具体案例的阅读中体会到这种差异的存在。对应于英语“honor”一词，中文与该词意思相同、相近和相似的词除“荣誉”外，还有“名誉”“名声”“声誉”等等。但是，考虑到原著作者一再强调的主题含义的解读在于该词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及特征，为使中文译本尽量保持原著核心思想的一致性，我们在文本中大多数涉及

“honor”一词的地方，采纳“荣誉”和“名誉”两种基本译法。即使如此，中文读者还是会觉得中间存在着细微但重要的差别。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读者在阅读翻译文本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使用或替换更为恰当的词语来对应“honor”一词，这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原著的深刻含义。

2011 年 10 月 24 日

朋友和陌生人：

写给中国的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英国财政部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的夫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承担了募集经费以帮助缓解中国的饥荒的重任。这一任务被称作“英国联合援华计划”（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该计划募集了大约 300 万英镑的经费，相当于现在的 1.5 亿美元。由于连年战事不断，中国正在苦难的境况中挣扎，英国人对此伸出了援手；令人感动的是，当时的英国人民依然在配给制度下生活，首都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房屋，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之后，他们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来重建自己国家的经济；就在这样的状况下，英国人民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帮助相隔半个地球的中国人民。

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人民，并非介入红军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战争，因此，这笔资金被分配给对峙的双方，以缓

* 这是作者为本书中文版特别撰写的序言。

解当时中国的饥荒局面。1946 年，中国国民政府邀请“英国联合援华计划”代表团访问中国，现场了解这笔经费的使用情况。同年，克里普斯夫人带着女儿佩吉，与为数不多的同事们一起，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旅行；他们的旅途深入到共产党及国民政府分别管辖的区域，行程三万余英里。他们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他的妻子康克清，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他们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以及大量的小城镇与乡村地区。这次访问对这一行人构成深远的影响。在随后的三十年里，直至克里普斯夫人 86 岁，她一直担任中英奖学金基金会（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的主席，这一组织资助英国学者到中国工作，同时也支持中国学者造访英国。她的女儿在以后的生活里，也经常谈起中国人民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①

克里普斯夫人和她的女儿，分别是我的外婆和母亲，所以我知道上面的故事。因此，在我和姐姐与妹妹成长的过程里，我们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中国的景象，经常会谈论中国的情况。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里，我的外婆曾经到过香港，与中英奖学金基金会资助的一些学者见面，并且带回一块绣着大龙图案的丝绸，当时，这块丝绸就挂在外婆家我的卧室里，现在，它又挂在我的美国住家的大厅里。在我家的地板上，有一块地毯，上面有红军长征的图案，那是当年毛主席送给我的外婆的。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订购了一份英语杂志，杂志的名称叫作《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这是由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送到我们学校的。我从未到过中国，但

① V. 伊丽莎白·莫尔（V. Elizabeth Moore）：《我们和克里普斯夫人一起去中国》（伦敦：P. J. 出版社，1948 年）。

是，在我的世界里，中国占据着很大的分量。

成为一名学者之后，我开始考虑全球化对道德的影响；我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历史。在 19 世纪后半段，中国开始与美国及欧洲各国政府进行正式的直接接触，中、西方知识分子的交往也自此开始。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势力犯下很多罪行，从发动鸦片战争，到掠夺北京城，不计其数，不过，这些势力同时也催生出一小批欧洲人和美国人，其中一些人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学习过儒家的传统；儒家传统塑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它是很多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生活经验的结晶。

西方人的暴行，以及尊重中国的西方人，这是近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康有为（他在本书里占了很大篇幅）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要想强盛起来，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只有国家强盛，才能免遭英国炮舰的欺辱，免遭正在逼近中国各个城市的西方或者日本军队的欺辱。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人的暴行作了回应。不过，他们与亲华的西方人的交流，有助于他们理解西方的思想传统，在他们作出回应的时候，会考虑得更加周全。理解了其他民族的思想之后，他们也加深了对自身传统的理解。他们没有放弃中国人的传统，他们只是希望，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交流，能够让他们学习更多的东西，并以此为指导，对中国人的传统进行改革。

他们作出的回应之一，我在本书里也讨论过这一回应，就是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某些习俗，比如缠足习俗，当然也包括吸食鸦片，不仅有损于中国，而且也有损于中国在外国人心里形象，尤其是那些最了解中国、最尊重中国的西方人。越来

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废除缠足习俗并不等同于废除中国人的传统：毕竟，儒家学说没有主张这样的习俗；缠足习俗对女孩和妇女的伤害，至少在宋朝就有了批评之音，也就是说，在缠足习俗兴起不久，就有了反对的声音。不过，对中国人传统的反思，确实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对中国持有尊重态度的外部人士的交流之中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道德革命，终结了长达一千余年的缠足习俗，其间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进行了有益的对话，在我看来，这种对话再次表明，身处其他社会环境里的朋友们（可以说，他们既是朋友，也是陌生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国家确实需要改革；这样的对话有助于推进历史进程。过去，很多朋友谴责美国人对黑奴的残暴行径，谴责美国人拒绝承认解放了的黑奴后代所拥有的各项权利，他们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敦促我们找回更好的自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美国独立宣言》里写到，“对人类的舆论，要优雅地表示尊重”。美国以外的朋友们批评美国公民在关塔那摩（Guantanamo）剥夺战俘的人权，批评美国监狱里骇人听闻的环境，批评美国公民蔑视政府在死刑管理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公正精神；至少有一部分美国人意识到，这些朋友因为尊重我们，所以才会提出批评；他们既是美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陌生人，如果我们背叛美国文化和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与个人一样，国家所做之事，也会赢得或者失去他人的赞美和尊重。我在本书里论述过，要保持你的荣誉，就必须意识到，你的行为是否值得他人的尊重。中国的爱国者，和美国的爱国者一样，也与所有国家的爱国者一样，都珍惜自己国家的

荣誉。你不必担忧一些外部人士不知道如何公正地评价中国，也不必担忧一些外部人士对中国抱有无知的歧视态度。但是，如果你关注祖国的荣誉，你必须意识到，那些陌生人——他们同时也是你的朋友，了解并且珍视中国——是否开始失去对你的尊重。有的时候，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比如，他们批评美国士兵在关塔那摩或者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的虐待行为，如果你珍惜自己国家的荣誉，你就要努力工作，改变自己国家的面貌，让祖国赢得你本人的尊重，同时也赢得全世界朋友的尊重。

我认为，对全球性对话而言，对不同社会之间的必要讨论而言，荣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这样的对话和讨论，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全人类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上面的论述，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受到污染的环境，全球性诸如艾滋病之类的疾病蔓延，相互关联的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由陌生人同时也是朋友组成的世界。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论述全球化对道德的影响。我在书里为欧洲和美国的所谓大同主义作了辩护。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安全地生活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世界里，作为同一星球上的居民，我们必须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做到相互包容；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我们也有权利去过不同于他人的生活。当年，我的外婆和很多人一同出发，去帮助中国人民，她的信念就是大同主义。我的母亲出生于英格兰，父亲出生于加纳，他们的婚姻，就是朝着大同主义方向共同迈出的一步。我父亲在即将去世之际，为子女们留下遗言，要求子女们永远记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他在恳求我们遵循家庭的传统。他是一位

加纳的爱国者，是非洲忠实的儿子，他的自传取名《一位非洲爱国者的自传》，但是，他同时也相信，他对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有一份责任。^①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指出，不同国家的人民已经拥有一种方式，他们相互帮助，努力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努力履行父亲的临终嘱咐；努力追随母亲和外婆的足迹前行。

对我来说，对中国信奉大同主义的朋友来说，中国的成功未来十分重要；听到有关中国的消息，不管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赞美，还是外部世界为中国的担心，同样都十分重要。康有为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平等交流，就是一个实例，双方都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获得教益。我愿意授权委托，将本书译为中文，作为对这一持续的交流过程所作的小小贡献，并且希冀从中国读者的反馈中学到有益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彼此或许注定保持陌生人的关系，但是我也希望，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2011年9月于普林斯顿

^① 乔尔·阿皮亚 (Joe Appiah): 《一位非洲爱国者的自传》(纽约: Pradger 出版社, 1990)。

序 言

本书的论证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道德革命的探讨，是否有助于对道德问题的理解？论证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科学革命的缜密研究，已经取得对科学问题的深刻认识。比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① 和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② 探讨了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产生了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顿），进而探讨了更近时期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产生了令人称道的量子物理学），最终形成有关科学革命的重要论点。

科学知识的发展，明显推动了技术的迅速进步。但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并非源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是源于渴望理解世界的探索。另外，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说，道德最终具有现实

①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② 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主要论著有《微观物理学问题》（1962）、《告别理性》（1987）等。

的特征：虽然它在道德层面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感觉，但是，就其本质而言，道德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革命是在短暂时间内发生巨变的过程，因此，道德革命必然引起道德行为的迅速变化，而不会囿于道德感觉的范围。然而，道德革命终结之时，正如科学革命终结之时，事物呈现崭新的面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哪怕只是相隔一代人，下一代的人都会问，“那时的人们思考什么问题？很多年里，我们又是如何思考的？”

基于以上考虑，我开始审视一系列道德革命，试图发现道德革命的意义所在。我很快发现，我所关注的那些毫无关联的事例，比如决斗习俗的消亡、缠足习俗的废除以及大西洋沿岸贩奴制度的废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上述每一事例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这些习俗或者制度终结之前，这样的讨论显然产生了重要的成果。讨论成果不仅流传了下来，而且，记录讨论成果的方式，对于其他文化环境和其他历史时期的人们来说，也是可以辨认与理解的。上述不道德行径终结之际，不论出现了何种情况，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目睹新的道德理念的出现，当时当地的人们并没有感到惶惑不安。决斗永远具有谋杀的性质，也是非理性行为，缠足是一种痛苦的自残行为，贩奴制度永远是对奴隶人性的践踏。

我惊讶于这样的事为什么没有被阻止。其次，更让我惊讶的是，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上述情况出现变化的时候，一种被约定俗成地称作“荣誉”的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这些事例的探讨，其结果汇集在本书之中。当然，决斗肯定与荣誉相关，这个论点并无新意；决斗习俗随着新的荣誉观念的出现而终结，这也并非新论。但是，我的看法是，真正让我们

惊讶的一种现象是，国家荣誉和社会阶层的荣誉在新世界的平台上淡出已久，然而，在废止缠足制度与近代奴隶制度过程中，这两种荣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来，以上事例与以下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认同（Identity），比如男性与女性、同性恋者与传统性取向者、美国人与加纳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信徒以及犹太人，在我们的情感形成以及行为选择中具有何种作用？我在早些时候完成的一本书里，探讨了诸种社会认同现象，比如家庭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等，是以何种方式将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获得对光荣与耻辱的共同认知。我特别关注荣誉与社会认同的关联问题，因为这是道德革命的核心，也是我探讨道德革命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这种关联值得关注。社会认同将道德革命与人类一种心理状态联系起来。长期以来，人类这一心理状态被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道德哲学家所忽视，尽管最近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领域里，它开始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一心理状态就是，人们对社会地位及受尊重程度给予深刻而持续的关注，我们人类需要获得一种如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说的 *anerkennung*，也就是“承认”。我们希望，他人应当根据我们的社会认同及职业，恰如其分地对待我们。我们需要他人承认，我们是有感觉的存在，承认我们需要对他人的承认。如果看到走在大街上的其他人，我们因为相互承认而目光相遇，我们都能体验人类的这种基本需求，也会基于这一需求而相互回应，达到相互承认的目的。这一过程是即时发生的，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探讨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人类希冀他人

承认的心理做过著名的研究。我认为，废奴运动的巨大能量源于获得他人承认的人类愿望，这个结论应该不会对黑格尔感到惊讶。

我的研究把我引入一个出乎预料的方向：现在我希望说的是，在思考如何拥有成功的人类生活的过程里，荣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拥有他所说的 *eudaimonia*（幸福）的那种生活方式。围绕 *eudaimonia* 展开的研究，被他称为“伦理学”。我认为，本书是对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贡献，同时，我本人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伦理学”这一名词。

Eudaimonia 一词一直被误译为“幸福”（Happiness）。在亚里士多德看来，*eudaimonia* 一词的真正含意可以更好地表述为：拥有 *eudaimonia* 就可以兴盛（flourish），我对“兴盛”一词的理解就是“生活美满”，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生活美满”与否则等同于是否与他人友善。我们对他人的义务，相对于指导我们生活的众多价值观念而言，只是一种次要的价值观念，我认为，有理由把这种特殊的价值观称作道德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说，决斗习俗、缠足习俗和蓄奴制度，显然都是一些道德问题。（奴隶、缠足女人以及死去的决斗者，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从这一视角出发，道德显然是伦理学的重要构成：对他人应尽之责是美满生活的必要构成。过去几个世纪的诸多特征之一，是人们愈加理解每个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不过，拥有美满的生活，仅仅在道德上保持完美是远远不够的，并且，令人困惑的是，探讨人类美满生活的要素时，哲学总是趋向于将生活的多元性过于简单化。一种美满生活通常包括家庭及朋友

的关系，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不仅有对他人的责任因素，也有出自爱心而自愿给予帮助的感情因素。很多人参加社会活动，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参加教会或者寺庙的活动；我们一起观看或者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我们介入地方和国家的政治活动。体验诸多珍贵的人类活动，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些活动包括聆听音乐、欣赏文学作品、观看电影和视觉艺术作品，还包括很多自主选择的活动内容，比如，学习烹调艺术、经营一座花园、研究家族历史，等等。人类拥有多种方式追求美满生活。

理解荣誉之于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方法之一是确认荣誉和尊重的关联。尊重与自尊显然是人类基本的德行，也是对 *eudaimonia* 的补充，它有助于美满生活的形成。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花了大量时间说服我的哲学家同事相信，一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因素，一直没有引起他们的认真关注。这些因素包括：人种与民族、性别与性行为、国家与宗教，等等。我们在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里，被赋予丰富的社会认同。荣誉就是一个被现代道德哲学家忽略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荣誉是一个关键问题，原因之一在于，与社会认同一样，荣誉可以将不同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关注荣誉，如同关注社会认同，可以帮助我们恰如其分地对待他人，并且帮助我们创造自己的美满生活。以往的哲学家曾经关注过这一问题，读读孟德斯鸠或者亚当·斯密的著作，或者就此问题专门读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就能有所了解。不过，虽然“尊重”和“自尊”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两个热门课题，但是，与此相关却区别明显的“荣誉”概念，似乎基本上被人忽略。我认为，现在是“荣誉”重新纳入哲学研究范畴的时候了。

本书探讨的几个历史事件具体而微地印证了不同时空环境里的荣誉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我们探讨荣誉概念创造了条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丰富了我们对于荣誉的整体概念的认识。从英国到中国然后回到大西洋的漫长旅途，让我们加深了对荣誉诸多特征的理解。它们并非孤立的地区性事件，而是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不仅对于新加坡、孟买或者里约热内卢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洛杉矶、好望角或者柏林的人们来说，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我相信，在上述任何地方，尽管各地对荣誉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是我们发现，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历史事件，它们留给我们的基本教益都是相同的。

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其他民族、其他时代和其他空间，我们还必须洞察当代生活。特别是，我希望通过对以往事例的探讨，获得必要的教益，并以此为指导，探讨当代世界环境中由荣誉引发的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以荣誉的名义对女性和幼女进行的谋杀。在本书第四章里，我们将在巴基斯坦旅行。我们试图理解与面对荣誉的阴暗一面；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教益，也适用于其他地方。虽然我关注的是巴基斯坦，不过，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以荣誉的名义发生的杀戮行为，绝非仅仅发生在一个地方。

以荣誉的名义的杀戮行为，不是当代环境下荣誉的唯一表现方式。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的目标是提出一些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正确地理解荣誉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的其他问题。“你们当时思考什么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向祖先提出的问题，不过，我们知道，一个世纪之后，下一代人也会对我们提出同样的问题。有谁知道，下一代人认为什么才是最不

可思议的现象？在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受过监禁处罚，数千人被常年关押。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禁止女性驾驶汽车。今天，在很多国家里，同性恋者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处以死刑。此外，还有鲜为人知的工业化耕种体制，数亿的哺乳动物、几十亿的鸟类过着不堪而短促的生活。在发达国家之外，人们忍受着极端的贫困状态。终有一天，人们将会发现，他们不仅意识到旧制度的荒谬与新制度的合理性，而且也会意识到，旧的方式蕴含着令人耻辱的因素。在向现代过渡的阶段里，很多人将改变做事方式，他们羞于继续按照旧的方式行事。今天，如果我们为荣誉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这一期望或许并不过分。本书的主旨是对荣誉做出解释，帮助我们充分认识到，荣誉对每个人都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瓦尔·杜尼肯（Val Doonican）^① 的爱尔兰歌手。他演唱的“向高处走”（“Walk Tall”）成为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在这首歌里，他唱到，当他只有“成年人的膝盖那么高的时候”，妈妈告诉他一个道理。妈妈说，“要向高处走”，妈妈还鼓励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虽然，当时我的个子只比成年人的膝盖略高，不过，现在我还能记得，这位妈妈的忠告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歌里的这位主人公在监狱里发出感慨之言，他没有听从妈妈的忠告而入狱。）瓦尔·杜尼肯有着美妙的歌喉，这首走红歌曲十分感人，不过，歌曲感动我四十余年的原因，是它对荣誉的简洁表述。荣誉的心理因素，与向高处走以及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理念，具有

^① 瓦尔·杜尼肯（1927—）：爱尔兰男歌手。